

97194111

今年是原万县中学校长、万县私立鱼泉中学副董  
事长、万县市副市长、四川省文化局局长杨吉甫同志  
诞生八十周年。特编此专辑，表示对他的纪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  
万县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1984年5月

杨吉甫部分遗著

其中：《诗选》于一九七七年六月由何其芳同志编辑。

《译诗》一九七九年春由瑞典汉学专家马跃然编辑，在瑞典文艺刊物上载出。



杨吉甫先生，字子佩，四川成都人。早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曾任教于该校。其诗作风格独特，深受读者喜爱。《诗选》一书收录了其代表作，由何其芳同志精心编辑。《译诗》则展示了其深厚的汉学功底，由瑞典汉学专家马跃然先生编辑，并在瑞典文艺刊物上发表。《文集》则更全面地展现了杨先生的文学成就。杨先生为人谦逊，治学严谨，其遗著得以整理出版，实为文学界之幸。

## 目 录

|                |                            |
|----------------|----------------------------|
| 杨吉甫墓志          | 刘孟伉 ( 1 )                  |
| 杨吉甫先生战斗的一生     | 何锦沐 徐南洲 殷逸民 ( 2 )          |
| 我的记忆           | 方 敬 ( 13 )                 |
| 回忆和吉甫相处的日子     | 田 稼 ( 18 )                 |
| 师道光辉           | 张学培 ( 20 )                 |
| 回忆良师战友——杨吉甫同志  | 熊道光 ( 22 )                 |
| 良师楷模 风范长存      | 徐尧琴 ( 24 )                 |
| 杨吉甫在狱中         | 周季之 ( 26 )                 |
| 热忱的服务 崇高的情操    | 陈一屏 赵鸿鹄 张大圆 黄克家 吴承汉 ( 28 ) |
| 忆亲人            | 徐寿瑞 ( 31 )                 |
| 追念我的爸爸         | 杨临滨 ( 32 )                 |
| 岁月冲洗不掉的记忆      | 吴承汉 ( 34 )                 |
| 恰如其分的盖棺论定      | 向云鹤 ( 39 )                 |
| 附：畅想曲          |                            |
| 常绿斋            | 黄克家 ( 43 )                 |
| 冬天的记忆          | 向 晓 ( 43 )                 |
| 忆吉甫老师          | 戈 白 ( 44 )                 |
| 编《杨吉甫诗选》后记     | 何其芳 ( 46 )                 |
| 读吉甫遗诗          | 何其芳 ( 47 )                 |
| 附录：杨吉甫诗六首、散文两篇 | 杨吉甫 ( 47 )                 |

# 杨吉甫墓志

刘孟伉

吉甫，四川万县人，先世世为农，故其生平生活习惯，并与农近，而雅好文艺，足以相发，杰然能自见焉。1924年，毕业于万县中学，随考入北京民国大学，时鲁迅方以文章奋发于《语丝》，吉甫乃与乡友刘树德、刘进修等共创刊物曰《夜光》者，以相鼓荡，其一生战斗之热，至老不竭，当自此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至成都，参加反帝同盟，任区书记。所著有小说曰《更夫》《晚归》《李二嫂》等篇。1937年“七七”事变起，主编万县《川东日报》文艺副刊，又自办《长城》副刊，一以抗战为的，其文多不备举。1940年，始主办万县中学，持续四年。凡所掩护进步人士及成就优秀子弟，为数甚巨。1945年，更于县南所居白羊乡，创办私立鱼泉中学，自任董事长（按：应为副董事长）。次年秋，遂被捕入狱。以万县百余教职员签名救免。吉甫少即多病，中岁得咯血疾，至是其气愈坚，其力愈韧，而疾久不愈。解放后，由万县咨询委员会委员，被任为市建设局局长，旋被选为万县市副市长、川东行署委员。合省后，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54年被选为第一届人民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协助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55年任文化局长。58年连任第二届人民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62年11月10日、壬寅十月十四日，疾发以卒。越十日，礼葬于磨盘山之原。距生于1904年11月7日、甲辰十月一日，年五十有八。原配黄蜀笙，前卒。继室徐寿瑶。子临滨，女柳荫，并黄出。子妇刘敦贵，女婿黄导。呜呼吉甫！予教授万中时肄业所及生也，乐与予游，予以重器之。其卒，予病未能往吊；其葬，未能往送；墓且成，乃约其行迹，为此志焉。其遗文若干篇，同学友何其芳等，方将谋为编印。铭曰：

自拔于俗，确乎有守。死且不畏，疾复何有。十二年来，带病工作。或劝其休，不改其乐。无不假年，未竟所施。党曰失友，群曰丧师。遗文在笥，后死之责。我铭不刊，庶彰居德。

# 杨吉甫先生战斗的一生

何锦沐 徐南洲 殷逸民

整个二十世纪的上半页，是灾难深重的中国由半封建半殖民地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的时代；是中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奋斗，前赴后继，争自由求解放的时代；是黑暗的旧中国，转变为光明的新中国的战斗时代。杨吉甫先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出生在万县一个偏僻农村的农民之家。在激荡动乱的年代里，在马列主义熏陶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他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由一个民主主义的战士，成长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战友。

## （一）在党的影响下战斗

杨先生的幼年，念过几年私塾，爱好陶渊明的诗文。他喜爱大自然，热爱劳动人民，承继祖辈、父辈的质朴、勤俭本色，和正直无私的传统家风，从而养成了他热情、谦逊、廉洁等良好品德。一九二〇年，他十六岁的时候，在万县县立中学读书。校长熊友竹，是个受了《新青年》影响、思想开朗的人，聘用了一些进步教师。这些进步教师，对杨先生的革命思想，起了启蒙的作用。杨先生回忆说：“当时有个教师倾向于苏联的政治制度，通过他平时言谈，使我知道共产主义，开始认识到旧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一九二四年，杨先生到北京上大学。这时，中国的工农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革命的高潮正在形成。北京这个古老的城市，当时为北洋军阀所盘踞，黑暗与光明，反动与进步，正进行着殊死地搏斗。青年时代的杨先生，在这斗争的激流中，思想逐渐觉醒。他听过鲁迅先生的课，喜读鲁迅先生的著作，受到启迪和鼓舞。他与思想进步的刘树德同志（林铁）志趣相投，感情深厚，曾共同创办刊物《夜光》。创办《夜光》的目的，据杨先生说：“这是要用自己的‘夜光’去刺破黑暗的夜空”。他积极写小说和杂感。一九二六年，杨先生读完了大学预科，暑假，回到万县，在一个小学里任教一年。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全国各地笼罩在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恐怖气氛中。当年秋天，宁汉分裂。这时杨先生到南京，在中央大学旁听，经常阅读《语丝》《奔流》和《北新》等书刊，同时与当时在南京的一些同乡好友交往密切，常作形势研讨，进一步识别了反动派反人民的鬼域伎俩。一九二八年，他再度去北京，当时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李大钊同志，被军阀吴佩孚绞杀了。革命事业的损失，在杨先生的心中投下了阴影，他很苦闷，感到寂寞。这时，何其芳同志从上海到北京，战友的激励，增添了青春的活力。他们共同创办文艺刊物《红砂磧》，思想有了寄托。杨先生继续写作，发表了《逃兵》等文章。在作品中，他诅咒军阀的反动战争，迸发出革命的闪光。

一九三一年发生“九·一八”事变，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东北三省沦于日寇之手。

杨先生十分愤慨地参加了示威大游行，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罪行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当年秋天，他回到四川，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成都加入反帝同盟，担任区书记。他在《工商日报》编副刊，先后发表了《长庆》《更夫》《李二嫂》等小说和文章，谴责、鞭挞反动统治下的罪恶社会。由于过度的劳累，他咳血了，病情严重，体力不支，只好回到万县家中休养。几个月后，健康尚未完全恢复，却又去万县女中教课，参加社会活动。这期间，他认识了陈斐琴同志，他们志同道合，互相帮助，成了深交。

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他在县万中教课，任训育、任事务，还任级任老师。他每天早起早睡，以身示范。这时他创办了文艺刊物《枇杷》和《小诗专刊》，让学生们有自己的创作园地，学习写作，培育了一些进步学生。然而过度的辛劳，又导致咳血病复发，不得不再次回到乡下老家去休养。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发生芦沟桥事变，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阶层人民，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掀起了民族救亡运动。这个高潮，激发着每一个爱国的革命志士。杨先生再也不能安卧于病榻，由农村的老家进城去，会见了当时正在省立万县师范学校任教的何其芳同志。杨先生后来回忆说：“在一夜的谈话中，了解他已变的很好，我很喜欢。秋天，《川东日报》要我同他编一个副刊《川东文艺》，我们商量以抗战为内容，由党员学生张学培负责编出。”何其芳同志在副刊上发表了《万县见闻》，揭露政府腐朽没落的反动本质。后来因为副刊发表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文章，受到迫害，于是张学培不能继续担任编辑。这次办报受到的打击，加深了杨先生对反动社会本质的认识。

与杨先生有着深厚交谊的林铁、何其芳、陈斐琴等同志，虽与杨先生未能长聚一块，但他们所走的道路，正是杨先生所向往的。他们之间的思想交流，使杨先生跟党走的意志越来越坚定。何其芳同志在一九六三年追念杨先生的悼词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不在一个地方，又极少见面，然而始终是很亲近的朋友。这不但因为我们珍视青年时代的友谊，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后来都走向革命，一直在为同一个目标努力工作的缘故。”

一九三八年，杨先生接任万县第一区报佛寺小学的校长，聘请共产党员周厚钧、陈业勤等作教师，把这个学校办成一所朝气蓬勃的进步学校。进步的教师带着学生到农民中去帮锄秧割谷，培育学生爱劳动爱人民的美德；开展抗日宣传救亡活动，每周写墙报几十张，贴在二十里周围；领导学生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报，而且经常作时事报告，培养学生爱民族、爱国家的思想；学校里树立一股简朴的新风尚。女学生们学会穿草鞋，那些出身富有家庭的女学生，也逐渐改掉了娇气，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受到新思想的洗礼。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在大后方的四川，曾经一度有点民主气息，进步思想的传播，鼓舞着一些青少年学生去追随革命，追求光明。学校中好多学生憧憬着那时的苏联，向往革命圣地延安。

然而，这种好的形势，时间并不长久。武汉失守后，一贯仇视共产党的蒋介石，便与汉奸汪精卫联合，相互勾结起来，围攻坚持抗日的共产党，反共高潮一个接着一个。这时，有着水陆交通之便的川东重镇万县的反动派，也和其他地方一样，明的暗的进行着反共反人民的勾当。托派分子叶青，被他们派到万县大作反共讲演，颠倒是非，欺骗青年。接着就是疯狂地镇压从事抗日宣传、争取民族解放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先后查封了万

县的进步学校国华中学和国本小学。

杨吉甫先生十分痛恨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他在《川东文艺》上发表文章，针砭时弊，对抗逆流，特别是他撰写的《中国是那一条船》这篇文章，揭露反动派不抗战搞分裂的鬼域伎俩，戳痛了以万县专署专员程懋型为首的一小撮，他们暗地里咬牙切齿，磨拳擦掌，伺机反扑。

一九三九年，中国共产党万县党组织责成张学培同志再度与杨先生共同主办《川东日报》副刊《长城》，连续发表了臧克家、碧野、姚雪垠等进步作家的作品，唤起了人民群众，特别是鼓舞了成批青年为民族解放而投入抗日活动。一九四〇年上半年，《川东日报》上发表了《某中学》《一支蜡烛的光》等散文，揭露出万县文教界和三青团的阴暗丑恶咀脸，直接打击了万县的一个反动政客即县万中校长王作禹，恰好那时县万中的学生掀起了驱王运动，反动政府大为惊恐，采取一连串的镇压手段。这时的专员闵永濂，不但支持王作禹闹报社，要挟交出两篇文章的作者，还亲带武装到万中，抓走了学生何家言等六人，同时伙同三青团，以“异党份子”罪名，强迫《长城》停刊。在反动派的淫威之下，杨先生并没有被吓倒，他坚持“创作自由”，拒不说出《某中学》等文章的作者的姓名。他说“谁敢动我一根毫毛，必向全国文协控诉”，终于使反动政府没有实现他们“交出作者”的如意算盘。

一九四〇年秋，杨先生决定从事教育事业，他说：“我所见的社会，总是如此之坏，怎么办呢？想了一想，非办教育不可。”他不计个人安危，在文教界中开展了一场与反动派不屈不挠、针锋相对的斗争。

## （二）办县万中的斗争

万县县立中学，是杨先生的母校。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他又在这里任教，他对这所学校是熟悉的，有感情的。但是，他深知在反动统治下要搞好教育，特别是从王作禹的手中接办这个学校，是担风险的。在我地下党一些进步朋友的支持下，一九四〇年秋，他毅然接任万中校长。杨先生根据当时斗争形势，作了一番细致、具体的准备，拟定了一个行动纲领：

一、把代填的国民党党员证，用来当作外衣；

二、多吸收开明的和进步人士作教员；

三、要求有组织的教师，以学校的组织进行活动，不对外作横的发展，以免暴露自己；

四、收取国民党出版的反动书籍，堆在教职员阅览室，不让学生有借看的机会；

五、比较进步的书报由教员认清可靠的学生，借给他们看，并随时加以指导；

六、师生如犯幼稚病而暴露，就设法转移；

七、自己不直接介绍学生看激进的书。

这些，一直成为他确守的原则，所以他在学校党组织和进步教师的支持下，在县万中坚持了四年之久。

杨先生办县万中，以面向工农大众为方向，尽量满足工农子弟入学。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躲避敌机的轰炸，学校早迁到万县三正铺乡下，在那里，农民子弟能在放学

后，回家割牛草、干农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读中学，要当“童子军”，要穿“童军服”；读高中要受军事训练，穿“学生制服”。众多的贫寒学生，往往因为买不起这套衣服而失学。杨先生便打破“成规”，对那些做不起学生服的贫寒学生，任其随便穿着，长衫、短裤、草鞋、赤脚都可以。收费，则分别对待，对贫寒学生允许少缴或免缴，最穷困的则学食费全部豁免，或让其半工半读。对这些免费学生，主要由杨先生用自己有限的薪资来补贴。这使其他学校有的贫寒学生，宁愿舍近求远地来县万中读书。

杨先生作县万中校长时，除了按部颁的一般课程教学外，着重课外活动。为了不让学生成为读死书的书呆子，要求学生关心国家大事，树立是非观念，培育学生有为国为民的雄心壮志。他买回各种新的书刊，供学生阅读，让他们吸收丰富的精神营养，鼓励学生组织读书讨论会，活跃思想。在他倡导和支持下，课外活动时，阅览室、课堂、院坝、树林、溪边，都有翻书声或琅琅的诵读声。全国各种主要报纸做到每天张贴，并在一定时候分班级进行时事讨论。每周各班级出版墙报，作为交换读书心得、练习写作的园地。定期举行全校性的讲演比赛、话剧比赛、音乐比赛，都评优给奖，以资鼓励。每周举行寝室内务检查，课堂整洁检查，也评定等级优劣，用流动优胜锦旗督促搞好环境卫生。开展班级体育活动，进行球类比赛，加强体育锻炼，增进各班级的友谊。这些办法，丰富了学习内容，活跃了学习空气，使全校呈现出朝气蓬勃、热情向上的新气象。

杨先生担任校长，没有官气，没有丝毫绅士派头和市侩气。他处处从自己做起，作为全校师生的表率。在他入校的第一天，就给人们一种俭朴、宽厚、温和、慈祥、平易近人的印象。那是一九四〇年的九月份，开学了，同学们陆续到校。旧校长王作禹已被赶走，新校长还没有来校，但已传说是杨吉甫先生了。大家怀着好奇心，揣测、估计：“新校长是个什么样子？是穿长袍大褂，像王校长一样道貌岸然呢？还是讲课必称尧舜孔孟，开口就是蒋委员长呢？”有的说：“听说是个会办报、会写文章的文学家”“文学家是个啥样子？戴不戴近视眼镜？像不像个老夫子？”学生们在私下议论纷纷。

杨先生在大家想象和议论中，来到了学校。他穿着粗质麻色布的中山服，脚踏薄板草鞋，光着头，中等身材，衬着一付消瘦却很有精神的面容，第一次集合对同学讲话，人们都以为他要讲一篇大道理，或发表一通严厉的训词，谁知他却像讲故事、摆家常似的，娓娓而谈，使人毫无陌生和畏惧的感觉。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仔细领会他话中的意思。从此以后，同学们一见到他，立即迎上去，总要找点啥和他多说几句话。

当时学校中进步和反动的斗争是尖锐激烈的。杨先生总是支持进步，保护党的利益，而且往往是挺身而出。进步教师田稼，是从战区来的，爱写文艺作品，报上常有发表，他又常与一些名作家有联系，三青团份子凭着他们猎犬般的特殊嗅觉，一直以“异党份子”盯着他不放，总想抓住田的所谓“异党活动”，使杨先生脱不了干系，进而达到赶走杨先生、重新掌握这所学校的目的。杨先生洞悉其奸，一面叮咛田老师言行谨慎，一面在表面上与之疏远。

一位曾在万县县立师范学校教历史课的教师周季之（现万县市政协副主席），露了激进的锋芒，那里的校长怕担风险，便介绍他到县万中任教。周来校后，在与杨先生的接触中，感受很深，对杨先生的品格风貌，甚为崇敬。他有这样一段回忆：“我在一九四二年春，来县万中教书，到校那天，工友引我到寝室，另有两个工友抬来一张床，掉换原已安



放好的那张床。门口站着一个瘦瘦的个儿、光着头、身材中等、穿着麻色粗布中山服、脚踏一双草鞋的中年人，和颜悦色地微笑着。我以为是收拾寝室的工友，一点也未介意。一会儿，他走了，等床铺行李安置好后，工友也要走，我说，你们带我去见见校长吧！工友说，你已见过了，刚才他不是站在门口的吗？哎！原来他就是校长，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校长！简直太朴素、太平易近人、太和藹可亲了。工友说，校长见你身材高，叫我们把他用的较长点的床，抬来换给你，他自己用那短小一点的。这几句简单的话，在我感情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他这样的为人，把舒适让给我，而且亲自来寝室，具体地安排，这是怎样的关心和照顾！唉！他太好了。”周先生还说：“时间久了，我经常去他的住处聊天，他知道了我是在绵阳、三台等因呆不下去，才来到万县落脚，在县师，人家也有顾虑，才被介绍来县万中。他提醒我说，万县这个地方也不清静，离王家坡不远的果园那边有个宪兵司令部，经常抓人、整人，要注意哟！这种真挚、亲切的爱护，使我永远不会忘怀。”

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之下，物价一天几次狂涨，生活的重担，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许多人，日夜奔波劳碌，为穿为吃操心，可还是常有断炊受冻之苦。教师们也不例外。那时人们常说：“十年教书不富，一日不教便穷。”正是一般教师生活的写照。每年寒暑假，教师们都要投入争夺饭碗的所谓“六腊之战”，不知有多少教师，因为捞不上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职位，而陷于失业的境地。杨先生深切了解这些情况。他自己家中经济从来并不宽裕，女儿杨柳荫读完高中，因经济困难不能继续升学，杨先生却盛情邀约县万中经济特别困窘的教师去他家过夏过冬。他自我牺牲地对教师关心，一直到被撤销万中校长时，还继续如此。后来在一篇文章中，他顺便谈到这件事说：“在前年暑假（即一九四四年杨先生被撤职时），有几个万中的教师，在放学的第三天，便把剩下的薪金用完了，假如不请他们到我乡下的家中去，又不知道到那里去借债才可度日。”

杨先生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其深广的程度，胜过父兄。除了尽力解决贫寒学生读书的经济困难，给予就读机会外，还对那些最贫苦的学生，送给肥皂、毛巾，解决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需要。更胜于此的，是在政治上关心进步学生，保护进步学生。一九四一年春，县万中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工作，学生晏春福、殷渊明（即殷逸民）分管组织、宣传。当时万县党的领导人说：“县万中是个有利阵地，杨吉甫是靠拢我们党的忠实朋友，会有助于我们的工作的。”一次，有点幼稚而又冒失的学生陈天钰（党员，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牺牲在成都的十二桥，现埋葬在成都青羊宫烈士墓），把胡绳的《通俗经济学讲话》和天马书店出版的《支部工作纲要》退还给殷渊明时，被三青团份子抓着了。这个三青团份子，立即去找杨吉甫校长，要挟说：“殷渊明传递禁书，是异党份子，应该开除。”为了保护党的组织，杨先生成竹在胸，态度从容而又鲜明地说：“这些书刊嘛，书店公开卖出很多很多，不能算是违禁书籍，读这样的书，不算是非法，怎能以此随便开除人呢？开除他没有道理，是不符教育宗旨的，是不好的。”三青团份子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杨先生对政治上遭到迫害的学生，总是不避风险，不遗余力地进行援救。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殷渊明因被叛徒出卖，被国民党万县警备司令部抓走了。杨先生得知此事后，即四处奔走，利用当时万县反动派头子之间的矛盾，说动了当时妇女会主席赵安萱，向万县警备司令交涉营救。由于反动当局并未获得殷渊明是共产党的确凿证据，并由于殷在敌人

法庭上态度坚决，使敌人一无所获，终于得到释放。另一些学生如何家言等，原是在王作禹下台之前，被伪专员闵永濂逮捕入狱之后释放的。对这类政治上在反动派那里有案可查的“危险”学生，一般学校是闭门不纳的，杨先生不但让他们入学，而且对他们十分爱护。

杨先生在万县中学的四年，是在激烈复杂的斗争中度过的。他厌恶拍马奉承，鄙视那些阴险狡诈、官气十足、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家伙。正如他的诗句所说：“我宁愿挑葱卖蒜，也不愿和那些人来往。”他接办万中以后，首先遇到的就是人事安排上的尖锐斗争。他为了此事，有一次在国民党万县县党部里，指着书记长刘庭槐拍案大骂，拒绝他们插手干预学校的人事。对那些别有用心、野心勃勃的家伙，他一个也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他毫不妥协，弄得书记长老爷狼狈不堪。他接办万中后，也曾不慎聘用了一个训育主任张丹生，此人开头好像还老实，不久便摇着尾巴去投靠万县三青团头子邵嵩，领得了在县万中组建三青团的差使，配合反共高潮，监视进步师生的活动，猎获他们认为的禁书，明目张胆地站在学校进步力量的对立面。可是县万中好的师生是大多数，张丹生一伙是孤立的。一学期终了，张并未得到他主子的赏赐。张着慌了，害怕摔破铁饭碗，马上转舵，向杨先生说好话，哀恳留用他，一幅无赖之徒的面孔。杨先生宽大为怀，不与他一般见识，给他出路，介绍他去另一学校，打发他走了。

万县中学的校址，原在县城东郊的康家坡。学校搬下乡后，全部校舍被一个军粮仓库占用。一九四二年，学校的一部份班级，由三正埠乡下回迁，军粮仓库负责人，拒不退还教室、寝室，而且态度十分凶狠嚣张。学校被迫以地下室作课堂和寝室，有的师生因地气潮湿而生病了。一个学期过去，暑假中，杨先生邀请了万梁警备司令，邀请了专县其他头头和记者们，来校参观校舍被占用的情况，并举行座谈会，向社会呼吁维护教育。在会上，杨先生把学校被霸占、师生生病、妨碍教学、教育受摧残的大量材料公之于众，使反动头头们，看到可能出现众怒难犯的局面，不得不作了让步，促使仓库负责人陆续还出占用房屋。但斗争并未就此完结，一九四四年秋，杨先生离职，已将学校移交给新任的校长，这时仓库负责人，与新任校长勾结起来，节外生枝，竟诬陷杨先生“把仓库木料作校产移交了”，并将协助办移交的一个学生捆绑关押，准备送监，杨先生派人据理驳斥，才将学生释放。

一九四四年上半年，省教育厅督学唐昌时，到万县来“查学”，所到之处，不是参加吹捧逢迎的宴会，就是接受厚礼。来到县万中，既没有奴颜婢膝，也没有美酒佳肴，接待他的只是吃教职员一样的便饭。

不久，厅长郭有守也到万县“视察”来了。万县反动当局的头头们，集中市区中小学学生，在西山公园向郭邀宠，等待训话。县万中呢？仅在高中部派出少数代表，大多数仍然继续上课，不去参加捧场活动。第二天，郭有守到县万中“视察”，杨先生出面接待，见面后，郭有守见杨先生消瘦的面容，说：“你身体不好。”似有意奚落和挑刺，杨先生听后，回了一句：“我的精神很好，学生们的身体好，精神更好。”随后，郭到各班察看教学，杨先生说：“你看，哪一个学生的身体不好，精神不好呢！”郭有守知道杨先生的话是在针对他而说的，虽然很不痛快，却又无可奈何，只好快快而去。

杨先生对反动当局，从来是不畏淫威，鄙夷轻视。对共产党却是热情靠拢。他除了与

校外党员同志有接触外，还大胆聘用共产党员，和一些非党的进步人士，并随时关心他们，保护他们。一旦他们捅了漏子，或暴露了目标，他勇于承担责任，掩护他们安全转移。因之，他所主持的学校，便成为党在万县地区的文教据点。这当然会引起反动派的注意和破坏。三青团份子在活动，暗藏的特务学生在监视，校外在泛滥着流言蜚语，督学到校“查学”，厅长到校“视察”，都是别有居心的。然而有些进步教师却不注意当时的斗争形势，不讲究斗争策略。一件突出的事，是创办《文化旬刊》。本来以之作为教育和团结广大青年的文化阵地，与反动派斗争，有什么不可呢？可这样一来，却容易为敌人抓住把柄。当时杨先生不赞成这种作法，但因为这是正义的，也就无畏地大力予以支持，并担任了刊物的全部责任。果然家住万县的国民党省民政厅长胡次威，和万县伪专员曾德威，象抓住了什么，露出狰狞嘴脸叫嚣：“杨吉甫是共产党，怎能容许他继续作校长！”不久，杨先生被撤职，不得不退出他苦心经营达四年之久的这块阵地，离开了县万中。

### （三）鱼泉中学的前前后后

杨先生在任县万中校长时，就考虑到：如果将来不能继续办县万中了，便回乡去自己办中学。“我们要办自己满意的学校，只有去到农村，面向广大的劳苦工农大众，培养贫苦出身的人材，他们才知道艰苦创业，知道怎样为人民办好事情。”

一九四四年秋的一天，杨先生同周季之先生去杨家街口苏云同志那里，苏云同志向他们讲述毛主席在延安党校作的报告，对国际和国内形势的一些分析。苏说：“反法西斯战争已接近胜利，为适应将来形势发展需要，建设新政府，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我们的学校，快育人材，多育人材是当务之急……。”苏的一席话，更加坚定了杨先生自办中学的决心。他向苏谈了自己创办学校的想法，苏表示支持。回乡后，就马上积极筹划这件事。在自己山上砍树子，与农民工人合作，制好了书桌、床铺、书架等，上了漆，等候着使用。

一九四五年上半年，他又一次约周季之先生同去苏云同志处，说：“我的桌凳、床铺、办公桌、书架已准备好了，现在需要的，一是找钱作开办经费，二是找教员来教了，这两点能解决，马上就可以开办。”苏说：“钱嘛，十万、八万随时可取，要教员嘛，我去重庆找。”杨先生立即拟定了办学计划，提出与朋友们研究：

第一，不以学生为取钱的对象，太穷的免收应缴各费，使他们在家中吃了红苕、豌豆也可来校读书；

第二，不要把学生教成流氓；

第三，不要把学生教成奴隶；

第四，不要做面子；

第五，不要读死书；

第六，不要官僚习气；

第七，不要贪污之心萌芽；

第八，第九，……古今办学者的好主张都被吸取了来，并要求教师与学生生活一块，而导之以正。

一九四五年下半年，杨先生筹办的中学成立了，取名“鱼泉中学”。这个名字有两个

意义：一是万县在五代动乱时名叫“鱼泉”；二是贫苦子弟进这个学校读书，如鱼得水。为了应付反动派和防范外来的打击，学校请当时的参议长刘静修任董事长。刘先生是开明人士，慨然允诺，支持学校。杨先生自任副董事长，周季之任校长（一九四六年他被捕后，进步教师柴文石主动维持校政撑持学校，次年由熊道光同志担任校长直到解放），共产党员晏子飞介绍刘坚白任教务主任，共产党员吴季甫在重庆找来从新四军来的王留春、陈曦，浙江大学来的张天虹，以后又有育才学校来的李少白等人作教师，还有杨含章、向云鹄等人任董事，负责筹划校舍和筹集常用经费，解决校具添置、教师费用、贫寒学生食费，以及招收学生事宜，并将杨氏家族办的“太禄小学”接办作附小，由县万中一批进步学生主持，与中学步调一致，以保证中学的学生来源和素质。鱼泉中学的校舍，初先在万县全安寨，这是一座小型的碉堡建筑，内有一楼一底共十来间房屋，屹立在山巅之上，离杨先生的家约有一里之遥，是杨家的支祠。学校刚开办时，只有一个班，老师和学生勉强可以容下上课和住宿。逐期增添班级，发展了，与小学部对调校舍，迁到杨家山杨氏宗祠。学生大多是农村无力进城求学的贫寒学生，这是一些纯朴忠厚、迫切要求进步的青少年。学校一开始，就树立起质朴、勤奋的风气，比起杨先生主办县万中时的学习空气，还要生动、活泼。教学内容，除了一般学校必修的课程外，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强的语文一科，着重选教育意义深刻、语言优美、生活趣味浓厚、能启发和吸引青少年、有益于思想建设的文章。古文，重刺时弊，如选用刘基的《卖柑者言》一类作品；现代文则选用进步作家短小精悍的文章，如鲁迅的《聪明人与傻子和奴才》，以及茅盾等人的小品文。对有特殊意义的时论文章，便以各班一起上大课方式，讲解后分班讨论，各人写出心得笔记，以提高学生思考和写作能力。每天课外活动，辅导学生阅读新书、新报，特别着重形势教育，经常开展时事讨论，引导学生关心国家大事，认识反动政府的腐朽本质，追求进步。在许多学生思想上已慢慢觉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希望在于共产党”。杨先生和一些进步的老师，与校外同志、进步朋友们保持密切联系，经常通过各种渠道，把进步书刊传到学校中来。《观察》《时代》《新华日报》《世界知识》等进步报刊，师生们经常读到；《挺进报》《整风文献》《延安一月》一类秘密书刊也在老师中传阅。学生每周开展生活会、讨论会，培养集体主义的新道德、新风尚。让学生自己管理生活，帮厨、运菜、生豆芽、做豆腐，以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品德和生活能力。

杨先生办学校，一直为着广大的劳动人民，培育学生成为有文化、爱劳动、爱人民的新人。在报佛寺小学就是那样，在县万中和他自办的鱼泉中学也是那样。一九四六年上半年，他在小学部，对师生作了“为谁学习、向谁学习”的讲话，用通俗的语言，阐明了深刻的道理，指明读书求学是学知识，学做人。“要向勤劳、朴实的劳动人民学习，不能向那些绅粮（地主）老爷学，他们抽大烟、吗啡；不能向场上那些拖半节鞋的滚龙、烂人（即流氓）学，他们成天游手好闲、东狂西荡。这些人都是不劳而食的。我们要学会自食其力、有益于国家，而成为中国未来的主人翁。”这一讲话，阐明了他长期以来坚守不渝的办学方向，师生们都受到深刻教育。

杨先生尊敬共产党、靠拢共产党，自觉地为党作了很多工作。本来他自己和中小学的一批教师，都是被反动派时时紧盯着的“危险人物”，鱼泉中学所在的双石场杨家山，也

很快被反动派目为“非法的禁区”。他不逃避危险，照着他坚持的方向往前走。一九四七年秋，地下党员雷季平，曾带人去鱼泉，打算和杨先生联系建立武装，（杨先生未在家而未谈成）不久，地委负责人涂孝文，授意殷渊明与杨先生商谈武装问题。他支持搞，但很慎重提出：“我们这里已为反动派注目，要搞武装得考虑配备深懂军事的领导力量；有了武装时，一旦敌人进攻，我们应作那些努力，不能无退路。”一九四八年，万县党组织遭受大破坏，涂孝文成了叛徒，殷渊明从包围搜捕中得脱，离开了杨家山，这一计划未得实现。没有掌握武装，解放前夕散兵游勇和乘机抢劫的匪徒较多，杨先生为了治安秩序，鼓动开明人士杨含章出来担任白羊乡乡长，搜缴了地主枪枝，控制了粮食，防止了可能发生的骚扰破坏。

杨先生开办鱼泉中学前，不但和朋友们研究好了办学计划，还制定了具体措施，对教师质量和来源也有具体要求。他说：“我们吸收有革命性的人来维持我们的学校，有无穷的来源，不断地有人去，不断地有人来，学校成了个集散地，也成了进步人士的转运站，我们学校就不缺教员了。”学校开办时有刘坚白等同志在那里任教，以后还有向晓、杜嗣馥、刘立平、余泽民、丁耀庭等党员同志和一些进步教师陆续去教过课。

反动派极端仇视这个学校，使用各种卑污手段，企图搞垮鱼泉中学。恶毒地拉拢熟悉杨先生情况的、甘心出卖灵魂的王必显。利用他对鱼泉中学有着私愤而使他成为向鱼泉乱吠的狂犬。利用他作为中统通讯员，散布流言蜚语，制造谣言以乱视听。这样开了端，顿时妖雾四起，群魔乱叫。县党部书记刘庭槐，恶毒诽谤杨先生“开辟了第二战场”，反动政客王作禹叫嚣“杨吉甫在搞边区政府”。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反动派快要对鱼泉中学下毒手了。从一九四六年春天起，他们经常派出特务，到鱼泉中学附近，进行窃探监视活动。

这年秋天，他们在万县城里和杨家山，同时动手。杨先生在城里，周季之、刘坚白在学校，同时遭逮捕。到鱼泉中学捕人的一伙特务，先扮着客人混入学校参观，趁师生们都在上课时，暗暗投放吗啡小纸包和吸吗啡的锡薄纸，当他们布置妥当后才吆喝着包围学校，声称：“清查烟毒，捉拿烟毒犯。”用这种栽赃陷害的卑鄙手法抓人。

抓人那天，万县县党部的《万州日报》，预为配合，早就写好了稿子，极尽诬蔑之能事，说什么“杨吉甫以全安寨为据点，贩卖毒品，招兵买马，集聚三万六千人”。全安寨开初仅容纳鱼泉中学一个班的师生，后来也只容纳一百多个小学生尚嫌拥挤，试问这能够集聚三万六千人吗？真是一个弥天大谎。

在狱里，反动当局妄图按照他们布置好的圈套，以达到陷害杨先生的罪恶目的。杨先生对敌人的阴谋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特务头子、伪警察局长艾兴权，主持第一次审问，幻想软化杨先生，他摆出一付假惺惺的面孔说：“吉甫呀，我们都是老同学，只要你老实……”他的话还未完，杨先生怒不可遏，勃然起立，大声责问：“我那点不老实？我办教育有什么错！”他的怒斥和威严，使狡诈的艾兴权无话可答，只好连说“请坐、请坐，不必发火。”义正辞严的杨先生，促使理屈词穷的艾兴权，只得草草收场。敌人当然是不会善自罢休的。艾兴权第一回合失败，便派出狗腿子进行威胁、逼迫，要杨先生承认刘坚白是地下党员，承认鱼泉中学有共产党活动。杨先生既愤怒、又鄙视这些家伙的无耻，他痛斥和揭露他们所捏造的一系列事实。对他们阴谋陷害的无赖勾当，不屑与谈。狗腿子们也只

好夹着尾巴溜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刘庭槐出动了。他派人转达，要杨先生悔过认错，杨先生气冲斗牛，怒对来人：“你去告诉刘庭槐，他才该好好向我悔过！”并随口朗诵一首对联：“舍主义而谈党（指国民党），空有党架；违良心以顺人，实无人格。”这副对联，杨先生出狱后曾当面念给刘庭槐听，嘲讽刘的卑鄙无耻和空虚，好似锋利的匕首，掷向刘的心窝，使刘哭笑不得，窘迫难堪。春节时杨先生又书写成春联，贴于家中大门上。杨先生在狱中，不为反动派的淫威所屈，不但自己和反动派坚决斗争，还鼓舞周季之、刘坚白决不写悔过书：“我们办学无罪，决不能屈服低头，我们无罪可悔，有罪的是他们。”带动他们共同斗争。他的行为，也教育了其他关在监狱的人，那些人对杨先生说：“我们没有见过共产党，如果像你这样正直的人是共产党，看来共产党确是好人，是为国为民的英雄好汉，倒是值得我们佩服的。”

当时的万县各界人士，对反动派逮捕杨先生，普遍表示愤慨，同时对杨先生在狱中的斗争纷纷给以关怀和支持。万县文教界知名前辈、清代举人熊国璋先生，亲往探监，向杨先生们致以慰问。文教界另一前辈，杨先生的老师熊友竹，质问艾兴权：“办教育是好事，人家办点好事，就被你们说成是共产党，你们这不正是宣传共产党专办好事吗！”熊老先生逢人就宣传说：“鱼泉中学有如唐僧取经，经历了八十一难，总会成为正果的。”万县文教界的牟健候、黄道成等百多名教师，集体签名质问反动派，坚决要求释放杨先生。省参议会也作呼吁声援。在南京的亲友杨秉离等，在反动派政府上层中奔走营救。当时在重庆出版的《大公报》《新华日报》等著名报刊，或报导消息，或发表评论加以抨击。所有这些营救的呼声，使万县的一小撮反动派，意识到情况不妙，他们做贼心虚，惧怕继续关押杨先生会激起人们更大的公愤，只好把杨先生、周季之等释放出狱，不了了之。

反动派的破坏，对刚刚建立不久的鱼泉中学，是严峻的考验。学校的师生们，并未被反动派的淫威所吓倒，进步教师柴文石与全校同学团结一致，一方面坚持上课，一方面发出快邮代电，向社会揭发反动派破坏鱼泉中学，陷害杨先生等人的罪恶阴谋，呼吁一切主张正义的人们给予支持和援助。小学部也立即抽出主要教师何锦沐同志到中学去，保证教学的正常进行，给了那些企图搞垮鱼泉中学的坏蛋们，以有力的反击。整个学校生机勃勃，斗志昂扬。这段时间也混进了个别别有用心心的坏蛋如宋达仁、邱弟清之流，但很快就被识破了。严酷的斗争，使人们得到了锻炼，学校得到了巩固。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国统区的斗争在继续，并不断取得胜利。蒋家王朝面临崩溃的前夕，对革命进行疯狂的镇压，妄图挽救他们垂危的命运。特别当重庆的“挺进报事件”发生后，白色恐怖笼罩着万县江城，茶楼、酒店、旅馆、商场，到处都有特务活动。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民主人士，被盯梢，被逮捕、被暗杀，几乎每天都有人失踪，连那些对反动政府说几句不满的话的人也难幸免。在鱼泉中学，与万县城来往要道上的杨家碑、独树子、黄柏溪，成了特务的出没之地，他们的目标就是白羊坪杨家山，而且很快就下毒手：抓走了鱼泉中学杨含章及学校的同情者杨子乔，不久，又先后包围杨先生的家，包围小学部，搜捕杨先生，搜捕殷渊明。由于杨先生、殷渊明有所警惕，相继出走，与特务周旋于云阳、万县边境。“鸟自离飞，罗当奈何！”特务们总是扑空。

同特务周旋的逃亡生活是艰苦的。杨先生本来就有病，身体很弱，经常昼藏夜行，打

破常规地饥餐渴饮，营养不济，有时还不得不“穴居野处”。他的身体越来越消瘦了。可是，他怡然自得，不以为苦，而是充分利用这些时间，有计划地学习，读诗歌、读进步书籍、读秘密流传的刊物资料，有时还挥笔写下抒怀的诗篇，反映了他的乐观情绪。他在《寄云鹄》中有两句诗：“待得春风至，清波共逐流。”表达了面对黎明前的黑暗，毫不悲观彷徨，对即将到来的明天，满怀信心。

杨先生在逃亡生活中，念念不忘鱼泉中学，他一直操心着学校经费的筹集，操心着教师的聘用，操心着师生的正常教学。临近解放了，他到学校，为师生们作分析形势的讲话，鼓励大家准备迎接解放，配合接管，昂首阔步进入人民自己的世纪。

#### （四）在新中国的日子里

万县解放了，杨先生日日夜夜殷切盼望的日子来到了，他有说不完的兴奋，一切新鲜事都使他喜悦。他在内心深处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他说：“此后不惊心于突然的犬吠与异样的行人，我完全宽怀了，在夜里直睡到天明。”他参与国家管理，学习如何当家作主。他说：“我学习于一些有希望的事，从一些生疏的然而新鲜的问题上，我开始研究。”

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领会党的一切指示。在经济恢复期中，他发现有些干部对民族工商业者有着左的作法，他不计个人得失，不怕“杨吉甫遭了糖衣炮弹”的讥讽，及时向上级反映，使党的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得到正确执行。川东行署有位党的领导干部分说：“杨吉甫是民主人士中真正的左派。”

解放后，杨先生任过万县市副市长、任过四川省文化局局长，是省人民代表、省人民委员。他在任职的十多年中，虽体弱多病，但他却说：“人不能一日无工作。”因此，长时期带病坚持工作。在万县时，曾因工作过度劳累，晕倒在路边。有时正在开会发生了胃痛，便倚靠着桌子，用拳头顶住胃部，坚持下去。在省文化局工作期间，还去农村巡视。在工作之余，他坚持学习，读政治经济学，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还读文艺作品。他总是因学习时间和精力不够而烦恼。常常说：“尚未翻开的那些书，早已等待着我。”一九六二年，他在重病中，读到老友何其芳同志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诗，他满怀炽热的感情，奋发着生命的火花，渴望重新挥笔上阵。他在《再写》的诗中写着：

读到朋友美好的诗句，  
想起了自己的笔墨。  
熟人们都盼我再写、再写，  
是啊，  
要高歌不要沉默。”

但是，病魔终于夺走了他的生命。就在他“要高歌不要沉默”的诗句写出后不久，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日的晚上，年仅五十八岁的杨先生与世长辞了。杨先生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赤胆忠心地为党为人民，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口气，在他逝世之前还高呼：“我不会死，我还要斗争。”原万县地委书记燕汉民同志在悼念时赞誉杨先生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坚强战士，社会主义时期的忠实同盟。”是的，杨先生的死，使党失去了一位忠实的同盟者；我们这些杨先生的学生，痛失良师。

# 我——的——记——忆

方 敬

## 一

一九三一年夏天，我从上海回到家乡万县，不久到秋天杨吉甫也从北平回来了。他，象一个老朋友似的，自自然然地来到我家里，一见之下，我也自然而然地把他当做老朋友。以前，我从他在北平同何其芳自办的一个小文学刊物《红砂碛》上看到他的名字和他的文章，其芳也几次在信上谈到过他。我觉得“吉甫”象一个老先生的名字，又听说他比我们都大多少岁，我想他也许有点儿老气。现在，亲见其人，虽然清癯，面带褐色，而却还年青，尤其是谈起话来更使人感到他的精神很年青。在日后的交往中，越来越觉得他年青。他爱新文学、新思想、新事物，喜欢同年青人做朋友，与年龄比他小甚至小得多的人亲近，合得来，谈得对头。他一生似乎都是如此。何况他当时也才不过二十七、八岁呢。

吉甫家住远乡，只要他进城，总是要到我家的。我们闲谈，谈生活，谈文学。他自己喜欢文学，也高兴别人喜欢文学，而且引为志同道合。他写得少，但他希望别人写，多写一点。他赞赏其芳富于诗的气质，有诗的创作才能。吉甫阅读的兴趣比较广，关于花鸟虫鱼的书籍也喜爱。他向我介绍法国著名昆虫学家的名著《昆虫记》。法布尔不但对昆虫学的研究独到精深，而且内容饶有诗趣。他整个生命都沉浸在美丽的昆虫世界里。这部大书我是很有耐心而又很满意地读完了的。有时我们还在堂屋里把两张方桌连接起来当作台子，同院里的孩子一同打乒乓球，他打得起劲，打出了汗，脸上浮现温和的微笑。

过了几月，吉甫应他的一个老朋友之邀，长途跋涉到成都去了。他在成都编新办的《社会日报》的副刊。他远远来信嘱我写稿，还特别说了也可以翻译一点什么短小的外国文学作品。当时我当然还说不上写，更说不上译，但是他热忱地对我的希望和鼓励令我感动。我仿佛记得先寄给他一首很幼稚的诗，然后，为了不辜负他的一番好意，我就动笔初次试译了一篇原文比较易懂的短篇小说。那是取自美国《一角蓝皮袖珍丛书》里的一本小书，是写美国的种族歧视的，写的是一个有艺术天才的黑人孩子画了一幅很美的画，在当

杨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他是没有死的。他的音容笑貌永存，他的业绩永存。对于曾经同他一道战斗和生活过的战友和学生，脑子里都有深深的记忆。

本文作者何锦沐，四川省科委调研室主任

徐南洲，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殷逸民，重庆橡胶技工学校校长



地儿童美术评奖中受到无情的排斥，奖赏却极不合理地给了一个远不如他的白人孩子。吉甫看了，很同情那个黑人孩子，憎恨种族歧视，喜欢那篇小说，在副刊上发表了。我也很高兴，那是我最初的翻译尝试。不是吉甫，我不会那样早就胆敢做什么翻译的。十年以后，我才算是正式陆续翻译了一些外国散文、小说和诗，在报刊上发表或者出书。最初这篇小说的翻译似乎可以说是以后翻译的一小粒种子。

岁月匆匆，那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不觉吉甫逝世已足足二十载。他辞去人间时才五十八岁，而现在我这个比他小十岁的朋友已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了。追思过去，恍然有感，又愤然而起，要想夺回失去的光阴，夺回过早失去的吉甫和过早失去的我与吉甫的共同的朋友其芳，而千遍万遍诅咒万恶的魔鬼和死神。

吉甫珍惜寸阴，热爱人生，懂得生命的真谛。

日历只有这一页了，

我想不把它撕掉。

假如死神和恶魔没有狠狠撕掉他们生命的日历的人为的最后一页，他们还健在，仍然活着，那该多好啊！在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他们必然是新时代最好的歌手。“来者可追当益壮，问君汲汲欲何为？”其芳在一九七五年写的《忆昔》第十一首中的这两句诗不正是他奋发的心愿吗！就在吉甫去逝的一九六二年，他不是在他的《再写》一诗里唱出了“是呵，要高歌，不要沉默”的高歌吗！

## 二

一九三四年，我到北平去了。我先住在宣武门外会馆里一个小院的南房里。会馆里的同乡们都说法甫人好，都怀念他，老焦那个诚实的老仆人更是对他念念不忘。他们都怀着乡情和友情向我问到吉甫，都还希望他能再来。都巴口巴嘴地说我住吉甫曾住过多年的那间屋子很好。老树古屋，我觉得很亲切，仿佛仍有吉甫温和的呼吸，温和的沉默和温和的微笑。他曾在这里幽静地度着和谐的日子，陶养他的诗情，酿着诗蜜。壁虎在窗玻璃上停住，抽动着灰色的腿，或者在褪色的纸裱的墙上踟蹰。他望着想念他的昔日的那个“去年的旧蜂窝”却不在。小院角落上那株老槐树被风吹出的飒飒声，从南方初来的人常误听为淅沥地下雨。隔墙一天总是传来一个北方姑娘久久不断地苦练大鼓书的凄厉苍凉的悲调。似乎吉甫也还在这里与我们一同听着。

其芳有时远远从景山东街西斋宿舍到这里来玩玩。几个朋友坐在日光暖暖照着的窗前沿谈。爱人及屋，总不免想起吉甫，自然地谈到他，谈他住在这间屋子里的过去的生活，他喜欢小猫在他的脚前脚后绕来绕去。他喜欢案头或者墙角放着观赏植物的文竹和天冬草的盆栽。他吹去爬到他书上的虫儿，使它做一个跳岩的梦。他珍玩一片红叶，把它夹在他心爱的书里。他这间屋子是当时其芳的烦忧的托底所，他在那里可以找到平静、友谊和莫逆于心的谈话。

我到其芳景山东街西斋宿舍去。在他寝室里，他坐在长书桌前，我坐在园几旁，我们谈了起来。谈了吉甫，忽然他抽开了抽屉，取出一个小本来。那是他自己用道林纸页精致地装订的一本袖珍小册子，里面疏朗地剪贴着一条条铅印的吉甫的小诗。“他的小诗很像日本著名俳句诗人松尾芭蕉的俳句”，其芳说，一首首地指着，“你看”。他还能背诵其